

世象管见

吴启钱

技术发展到今天,但凡可以精准测量的事物,或被精确计算的东西,大数据加人工智能,都进行准确的预测或预报、设计或计划。无论是乌克兰上空激战的无人机,还是SpaceX的可回收火箭;无论是在核磁共振技术层层扫描后的病变苗头,还是远在几千里之外台风胚胎的“成长”轨迹……人工智能都能像“全知”一样,表现出只有神话中才会有那种超能力。

有人提出一种理论,可以把人工智能的这种超能力,运用到经济计划上,以解决“市场失灵”这个造成社会资源极大浪费的痼疾。

这种理论认为,计划经济之所以在上世纪遭遇失败,是因为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是分散的、不完整的,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,这与计划者有限的获取信息手段和处理能力之间,产生无法克服的矛盾。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虽然不能说专为解决这个问题“量身定制”,至少能提供最佳解决方案。所以,基于这种技术之上的经济计划,不但不会再重蹈覆辙,更可以体现出“构建理性”的巨大优越性。

确实,人工智能加大数据的发展方兴未艾,很多应用场景是现在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。但是,人工智能再强大,应用在宏观经济计划上,都不可能达到笛卡尔等十八世纪欧

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家们所预想的效果。实际上,连一个需要自负盈亏的大型企业,也难以靠人工智能对生产经营进行精准计划和设计,而不得不向“扁平化”方向发展,以灵活的决策机制处理多变更多样的市场信息。

这其中,人工智能无法预测人的情绪变化,因而无法掌握人因为情绪变化而导致的为行为变化,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设计,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。

经济活动既是人一系列行为的过程,也是一系列行为的结果。人的行为,除去基于本能的基本需求之外,多数出于个体理性的选择,还有一部分则由于人的情绪变化导致。

出于生命本能的基本需求,可以被预测被计算,因而可以被设计。比如一个人一天需要多少卡路里的热量,需要多少毫升的水,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重大变化,不要说人工智能,一个家庭主妇都能估算出一个家庭一个月应该买多少米。

出于个体理性的选择,则由于价值的主观性和主观价值的变化性,难以被计划。比如今天早上喜欢吃馒头稀饭,明天早上可能又想吃大饼油条。由于不可能使每个个体被计划在不同时间作出同一选择,

也不可能让所有个体被设计成在同一时间作出同一选择。

所以,无论计划者是人还是机器,都无法处理比海量还海量的数据,一个早餐馒头,都可能把超级服务器“噎”死过去。

由于情绪变化导致的行为变化,甚至有时候连本人也会在事后觉得匪夷所思,让人工智能去计划,显然更不可能。

近日,我在准备一趟回故乡的旅行,计划去超市买一些伴手礼。中午,根据自己的计划,走进一个综合体。大门口,保安让扫码,我没有任何犹豫,电梯下到负一楼,准备进超市。超市门口一位工作人员挡住,又让扫码。我说,楼上大门口扫过了才进来的呀。工作人员说,进超市必须再扫一次。

面对层层加码,如果我此时稍有点理性,我应该扫码进场,完成此次购物计划。手机就拿在手里,支付宝的页面也没有关掉,不会增加过多麻烦的。

但我一下子来了情绪,转身就走,心里还念着:“你加我一码,我少你一单,咱们谁怕谁!”

明明计划好并按计划进行着的事情,因这样一点小事,导致情绪发生重大变化,并进而导致行为发生根本逆转。这样的情形,自己在一两秒

钟前都无法预测,人工智能可能吗?这就是情绪的特征,没有征兆,无迹可寻。

人都是有情绪的,或者说人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动物。喜怒哀乐,七情六欲,让吃饱穿暖之后的人生,因经常变化而演绎出戏剧性的色彩,但也使人的行为捉摸不定,反复无常,“计划没有变化快”就成为常态。说来有趣,消费的增长,经济总量的增加,社会福利的提高,甚至人类的文明进步,可能都与人的情绪变化呈正相关关系。

比如,比男人更情绪化的女生,可能会因一点小事而生气,并因此去商场大买特买,也可能因为朋友圈中的一个点赞而开心不已,并因此去小吃街狂吃一通。这一阵狂买,这一顿大吃,一定是超出其基于生命本能需求的增量。如果没有这种因情绪变化而出现的增量消费,人类的经济活动,可能永远走不出简单再生产的循环。

当然,情绪变化不一定导致狂吃大买这样的“为”,也完全可能导致如我在某超市门口转身就走的“不为”——这个时候,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也得急流勇退,最强大的大数据也要退避三舍了。因为它们可能也知道,唯有情绪难计划。

如何引导社会的“分配预期”

新知

刘尚希

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:“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,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。”“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,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,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。”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,已经明确了构建分配预期的原则。

其中的“劳”是和自身努力挂钩的,既有简单的“劳”,创造低附加值;也有复杂的“劳”,带来高附加值,两者带来的回报自然是不同的。其中的“要素”是通过收入积累形成的财富进入市场来配置使用,通常表现为“资本”这个要素。获得财产性收入,也就是财富通过市场实现资本化。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财产性收入或资本性收入,必须承认和保护私人产权,并健全市场规则。

这也是明晰分配预期的一个重要条件。否则,就不会有人通过简单劳动、复杂劳动来创造和积累财富,也不会有人拿着自己的财富去市场上冒险变成“资本”办企业,或投资到别人的企业。一个社会有了清晰的分配预期,人人努力、人人参与和人人共享的社会格局就会形成,共同富裕就有了希望。这涉及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的关系。

促进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,就是防止两极分化,坚决稳住底线。而要做到底线公平,政府就必须必须在公共服务方面加大力度。我们党提炼概括出“七有”目标,即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

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和弱有所扶。这个“七有”是中国实践的系统总结,目的在于保障底线公平、防止两极分化。

所以,我们讲结果公平,应该更多从底线公平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,并实施结构性改革,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,而不是针对贫富差距泛泛地强调缩小,那样的“缩小”很容易落入平均主义的陷阱,导致国家发展停滞不前。世界上不乏这样的前车之鉴。如一些拉美国家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甚至造成老百姓生活水平倒退,原因就在于平均主义的政策倾向导致发展不能持续。

我们在强调底线公平的同时,还要承认结果的差距,就是不设天花板,不搞同步走。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,不是同时富裕,实际上是在部分人先富起来、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去不断地促进共同富裕。不能说现在我们要拉平、搞齐步走,这是不现实的。因此,我们在结果上还得承认差距的客观存在。

除了在底线公平上做足文章,更重要的是在发展机会上追求平等,让每一个人的努力与所得相匹配,实现起点公平、过程公平。这实际上是一个分配预期的问题。如果老百姓把分配预期的重心都放到政府身上,就意味着对政府的依赖性大大增强,反而会弱化劳动与所得之间的关系。如果大家不去勤劳致富,也不会去积极创新,只会等着政府让我富起来。一旦社会形成了这种预期,蛋糕就不可能做大,人的发展也会落空。从当前现实来看,如何努力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,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。

(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、研究员)
来源:北京日报

从地名视角看近代宁波社会变迁(之四)

宁波地名谭

徐雪英

1937年8月,日本战机首次轰炸宁波栎社机场,宁波陷入战火泥潭。据不完全统计,仅到1941年4月,宁波已遭敌机空袭735架次,投弹2124枚。战火中的宁波平民,伤亡苦难如影随形,随时降临。

大皎毋忘亭:突围战的记忆

海曙区章水镇有大皎,又名南山。村民姓杨,先祖杨仁贵于南宋宝庆年间从东钱湖青山迁入。因村前有大皎溪,故名。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,驻甬地方军政机关撤到四明山区,在大皎成立“四明山游击区司令部”,组织对敌斗争。为消灭抗日武装,日军同年5月大举进攻大皎。因被军政机关突出重围撤走,日军放火将大皎村变成火海炼狱。大量村民在火海中惨死。

现村内有“毋忘亭”,记录的便是这段历史。1972年,为建皎口水库,大皎村民迁移他地。迁入南山的那批沿用旧名大皎。2004年行政村调整,大皎、细岭、北山、下塘四村合并成立新的大皎村,至今亦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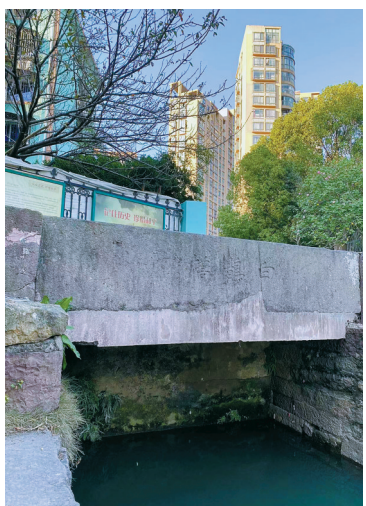
象山茅洋有日军“华中矿业公司”遗址,地处五狮山主峰北麓,茅洋钨矿区附近。钨,俗称萤石,是用作飞机制造的重要化工原料和冶金催化剂。1926年起,茅洋钨矿一直由当地民人负责开发。日本攻占宁波后,在该地划划矿区,驱赶居民,架设电网,构筑碉堡,开办起华中矿业公司,用各地抓来的中国平民,充当劳工,赤裸裸掠夺钨矿资源。据汉奸胡乃鹏1946年供述:在华中矿业公司,丧生的中国劳工约有2700人。现在钨矿周围仍有“万人坑”“杀人场”、碉堡、住房等遗迹散存。1997年,象山县在该地建成“日本



大皎村口的大皎商店



山通曲径的大皎村居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位于鄞州白鹤街道的白鹤桥
(朱晨凯 摄)

侵略军在象山罪行陈列馆”,以记此难。

四明基督教堂:对抗苦难的力量

鄞州钟公庙街道有四明基督教堂,以地处四明西路而名。战争降临后,面对伤亡苦难,更多平民选择皈依宗教,希望从宗教中汲取活下去的力量。再加上民国政府与基督教关系密切,因此即使在炮火隆隆的上世纪40年代,基督教仍在宁波发展壮大。

1937年,基督教传教士在鄞南傅家埭始建布道所。随着战争孤儿的增多,1943年,布道所建孤儿院收容无依无靠的难民。因为归属伯特利教会,故名三皇伯特利堂孤儿院。1949年后,孤儿院更名为新村伯特利教堂。1958年,教堂被政府征用。1985年,信徒在慧灯寺买下一间半房子,恢复该教堂,易名为钟公庙慧灯寺基督教堂。1995年,在今华裕路,政府拨地两百多亩,重建此教堂,新取名为钟公庙基督教堂。2008年,在四明西路地块,政府又拨地七亩二分,建造最新教堂,名为宁波鄞州四明基督教堂,

2014年建成,至今亦然。鄞州东钱湖镇有韩岭基督教堂,因地处韩岭村得名,始建于1940年代末。该教堂由金姓婆婆起头,初期借用民宅集会。1990年代,信徒们购入原韩岭胶木厂,改为教堂后,始用现名。2007年,迁至现址。

永安公墓:战乱中兴起的宁波早期公墓

鄞州五乡镇宝同村有永安墓园,为宁波早期公墓之一,建于1940年。公墓起源于西方。19世纪下半叶,随着西方侵略者进入我国城市租界,作为一种新式的具有严格管理制度和标准化建造理念的殡葬建筑——公墓,对近代中国的殡葬文化产生极大冲击。1928年,为解决人地关系及卫生问题,在民国政府推动下,宁波等地颁布公墓规程,推广公墓。可公墓安葬实行起来十分艰难,鲜有人响应。

随着战火的持续蔓延,贫民和流民数量不断增多,死亡率也越来越高。对不少底层家庭而言,有墓安葬已非易事。在政府及民间助葬机构的推动下,经济适用的公墓终

被越来越多的宁波人所接受。

除永安墓园外,鄞州东钱湖镇的万金、钱湖等公墓,也在这个时期所建。万金公墓地处东钱湖茶亭村,建于1940年。钱湖公墓则位于象坎村,因内设台北宁波同乡会墓园,故又有华侨公墓之称。

白鹤桥、团埂(ruán):战争胜利的历史见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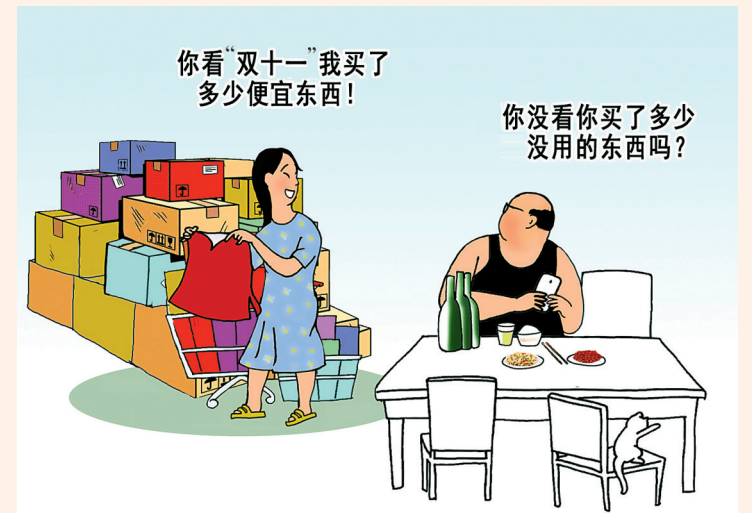
鄞州白鹤街道有白鹤桥,地处白鹤新村前塘河上。由6块3米多长的石板铺成,桥栏石上阴刻“白鹤桥”三个大字,护岸用浆砌块石。始建于宋绍兴二年(1095年),现主要为清代建筑风貌。据传在清同治年间,当地村民在这一带发现一只白色的鹤,被视为吉祥物,即用它们来命名此桥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,二战结束。同年9月13日,宁波在江东白鹤桥上举行受降仪式。日军八十九旅团、九十一旅团8530多名官兵缴械投降。侵占宁波的日军投降代表、“浙东联络部”部长草野昌藏签下投降书,白鹤桥成为中日战争历史见证者。

宁海西店镇有团埂村,东临象山港,村民姓戴。传戴姓之前,此地已有陈、蒋二姓居住。《戴氏宗谱》记,戴姓先祖起初由福建建甌迁居台州温岭南塘村。元至正年间,戴少詹为避纷乱,又卜居至宁海西店镇。因此处枕山面海,地如团聚,故名团埂。埂,本义为河岸边,此处作海边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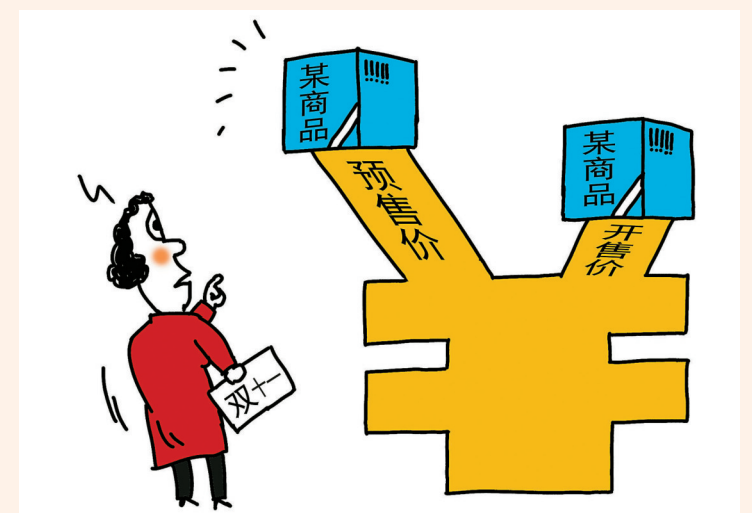
团埂村东原有一小岛,名东岙,现已与团埂相连,成为一体。1949年4月25日,蒋介石自奉化溪口启程,坐车换轿至团埂,由该岛下象山港,乘“太康”号军舰驶往上海复兴岛,后又远遁台湾。1949年5月25日拂晓,解放军六十五师一九五团和六十四师一九〇团在宁波市中心会师,宣告宁波胜利解放。由此,宁波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。

漫画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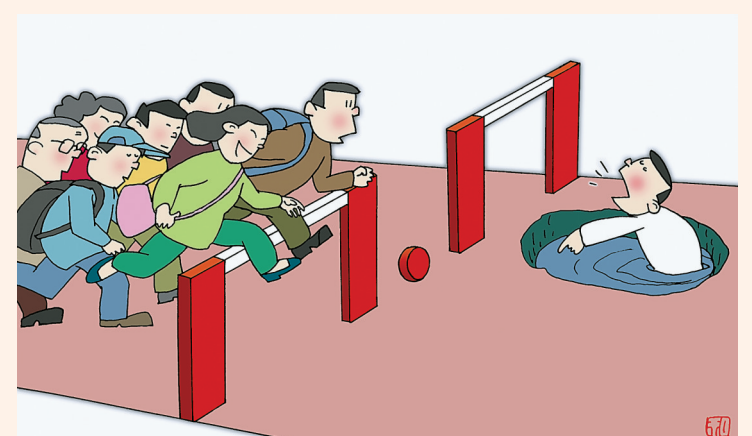
争辩

祁雪峰 绘



对比

罗琪 绘



提醒

王祖和 绘

随思录

韩浩月

据报道,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把生活数字化,并把这种新方式命名为“量化生活”。量化人生目标、精确时间管理让人生具有目标感、掌控感,但也带来了哲学方面的讨论:人的生活究竟能否被彻底量化?

从报道的例子来看,“量化生活”已经渗透到青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:有人用运动手表量化健康,每天监测自己的运动、睡眠、减重等目标,数字的波动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;有人量化自己的时间与人生目标,给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副业做好精准的分配,实现了两者兼得;有人量化自己的爱情,“陪伴4分,安全感5分,信心3分……”,通过给男友打分的方式,理性判断两人的相处方式是否合适。

辩证看待“量化生活”

相信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,每个人多多少少也能从这些例子看到自己的影子。专家与学者从哲学、心理、文化等多个层面对此表示担忧,这是很正常的,毕竟在人类过去的生存经验里,多数工作与任务是可合理量化的,而一些有关生活与情感方面的感性认知,不太适合量化,也不被提倡量化。因为在许多人的价值观里,一旦感性认知被量化,容易掉入“物化主义”的陷阱,会让人变得浮躁与焦虑,失去对生活与人生的通透体察。但在一个人们的生活全面被数据与智能开始包围的时代,也有必要对“量化生活”转变观念与态度。时间在加速,碎片化让人目不暇接,此时的“量化”,可以更多转移到对

时间与精力的集中方面。在理性方面,“量化”可以更加明确人的目标,找到并分清优质时间和垃圾时间的区别,让人的创造价值得以更好体现;在感性方面,“量化”提供了一种参考、校准甚至是安慰作用,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人认清自己与他人,有助于修正、调整关系与相处方式。

作为一名中年人,笔者其实无形中也在“量化生活”的包围中,比如用运动手表的数据,来督促自己生产数据,并从中参考自己的健康状况;比如量化自己的阅读时间,每天必须花费一小时以上或者阅读100页左右的书,如果没有这样的量化,每天读书的习惯就很难坚持……在今天,无论处在哪个年龄段,都可

以感受到量化所带来的激励效应,它也成了“坚持”的代名词,量化行为本身所携带的奖励机制,会有效促进人往好的方向行走与发展。

当然,单纯把人的行为变成数据,或者干脆让人成为数据的附庸,是万万不可行的。人有必要弄清楚自己与数据之间的距离与区别,在享受“量化生活”的时候,不被“量化”绑架。数据是人的服务工具,“量化生活”这一生活方式,也应当为人追求美好生活而服务。所以,人在过“量化生活”的时候,要为这种生活方式多注入一些人文色彩,别因为量化而让生活僵化。

如果“量化生活”带来了舒适感,增加了成就感,那可以量化的时候,干嘛不量化呢。